

论毕飞宇乡村女性小说中的权力叙事

内容摘要：毕飞宇的代表作品《玉米》系列和《平原》中刻画了大量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作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充分展现了中国 70 年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悲哀处境，她们的命运被社会时代所左右，无形中滋长出权力的欲望，进行疯狂的权力追逐最终却沦为权力的牺牲品。本文试通过作者的权力叙事角度，来分析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悲剧，探究滋生权力欲望的深层原因，解剖作者女性创作的疼痛意识，总结作者权力叙事的特殊性，并探讨权力叙事对毕飞宇创作的双面影响，对作者的权力叙事进行辨析反思。

关键词：毕飞宇 女性 权力叙事 玉米 平原

Power Narrative in Bi Feiyu's Rural Women Novels

Abstract: Bi Feiyu's representative works "corn" series and "plain" depict a large number of rich and full image of women. The image shows the sorrow situation of rural women in the 70 years of China adequately. The women whose fate were influenced by social era grew the desire for power virtually, and tried to chase for them which turned to be the victim of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gic fate of these women written by the author in a power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nd explores the deep reasons of the origin of the desire. And then makes a conclusion of the dominant character shows by the author's power narrative to discuss the doubl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by Bi, and discriminates and recollects the power narrative by the author in the end.

Key Words: Bi Feiyu; women; power narrative; corn; plain

目 录

引言	1
一、认同现实，步入权力秩序的魔方	1
（一）生存权力的争夺	1
（二）爱情权力的考量	3
（三）私欲权力的追逐	4
二、探究欲望，审视权力滋生的温床	5
（一）环境的狭隘与闭塞	6
（二）道德的异化与失落	7
（三）内心的脆弱与屈服	7
三、剖析策略，解读权力叙事的龃龉	8
（一）权力叙事的特殊性	8
1. 女性被放逐至权力边缘	8
2. 心灵深处依附的“鬼”	9
3. 体制和规则内的反抗	10
（二）权力叙事之双刃剑	10
1. 审美内涵的深层化	10
2. 女性疼痛的类型化	11
结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论毕飞宇乡村女性小说中的权力叙事

引言

当代作家毕飞宇成名于80年代，其作品相当丰富，涉及面也相当广，他不仅写过历史小说、都市小说也写过专门剖析人性阴暗面的心理小说，其早期的中篇小说《青衣》推动了他的创作高潮，随后的“玉米”系列、《平原》引起了更大的共鸣。毕飞宇的这些小说多以乡村现实作为题材，小说的语言并不犀利深奥，而是朴实无华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充分展现当时原生态的生活。

毕飞宇生于1964年，对文革时期有着特殊的童年记忆，当时周遭的政治高压氛围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权力关系成为他审视当时乡土中国和人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和独特角度。毕飞宇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与官、权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在权力的控制下，主人公最终都殊途同归地踏上追求权力的道路，就如毕飞宇早期的作品《孤岛》中所揭示的生命的顶点“是权力，是统治别人，驾驭别人的肉体与灵魂的统治力。人活着除了能支配别人外，还有什么趣儿！”

其实，权力不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都会产生很强的渗透力，使人们在不自觉间中认同和依附，而一旦这些依附成为了自然，那“趣儿”便会难以祛除。毕飞宇以乡村女性作为独特的切入点，写出了一群逐渐被权力意识所侵蚀的可悲的人：她们都期望自我价值被肯定，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去追求自我价值，然而命运多舛，落于人后而心生的“不甘心”往往给权力意识的侵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旦权力作为最简捷有效的途径而露出可为人们利用的一面，人们就会渐渐地趋向权力，主动配合权力中的游戏规则，却在不自知中反被权力控制、失去本真的自我而导致悲剧。

一、认同现实，步入权力秩序的魔方

女性其实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面对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所营造出的复杂稳固的权力体系，所要遭受的生存围剿远远大于男性，而把这种生存围剿放在70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她们的生存便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存、爱情、发展，只能围绕传统的革命话语和权力体系，青春、自由和理想都无法找到适合的奔跑方向。

（一）生存权力的争夺

《平原》中吴蔓玲作为南京知青到王家庄后，为了能够在王家庄真正生存下来，给

自己定下了准则：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她需要在王家庄立足下去，更需要获得在王家庄生存所需的荣誉和权力。

在这种内心诉求下，王家庄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随口说的一句“前途无量”就让她彻底迷失了自己。为了能够拉近“和贫下中农的距离”，她的舌头悄悄地拉直了：

“是”不再是“是”，而是“四”；“吃”不再是“吃”，而是“刺”。吃饭时“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面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吃完了，她也不回去，而是“撑着自己的大腿，站起来，打两个饱嗝，再把右手握成空拳头，跷出小拇指，剔剔牙。一边剔，一边和乡亲们聊聊天”。对自己近乎残酷的身体折磨让她变得“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由于狂热的政治理想，吴蔓玲成为了地地道道的“铁姑娘”，甚至连王家庄的人都认为她是王家庄的亲闺女。这些说明了作为村支书这个社会角色所要求的行为举止已经和她内在的人性融为一体，她获得了在王家庄生存的权力，却成为一个完全被时代政治化了的人物。

与吴蔓玲的主动追求生存权力不同，玉秀其实对权力是比较漠然的。当王连方被开除后，玉米脸上表现出了无所谓但其实心里却是真正在乎，而玉秀却是并不往心里去，她在自己的心里有属于自己的小想法。年轻貌美的她更倾向于向男性展示自己女性独有的魅力，并且一心一意地只想做狐狸精，她不满于乡野生活，表现出蓬勃的生命欲望。但是，玉秀确认和追求自我价值的方式却仍是种依附与谄媚意识，她最初人性中的简单纯真掩盖不了自身主体的精神缺失，期望以天赋美色来获取男性中心社会的受宠地位，一旦遭遇失贞，被抛弃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在玉米出嫁以后，玉秀在王家庄实在是呆不下去了，被逼无奈下只能去投奔在镇上的姐姐玉米，此时她才开始意识并且谄媚争取其在郭家的生存权力。但在玉米家中，她发现掌管她生存权力的不是玉米，玉米和自己一样都只是依附于他人，真正掌权的是姐夫郭家兴和其女郭巧巧，便使尽浑身解数取悦郭家父女，尤其是郭巧巧，将自己在郭家的工作定位于伺候郭巧巧，使得郭巧巧的模样很快就别于一格。而因郭巧巧的离家，抉择玉秀在郭家生存的权力又倒向了玉米这边，与玉米积怨已深并且向来在玉米面前心高气傲的玉秀不见了，她彻底地向玉米妥协了，“玉秀的眼睛终于眨巴了，目光开始软了，彻底软了，一直软到心，软到了膝盖。玉秀‘咕咚’一下，给玉米跪下了。玉秀是知道的，跪这个东西是永久性的，下去了，就上不来了”。玉秀意识到了，玉米不仅仅是自

己嫡亲的姐姐，不仅仅只是那个曾经在王家内部掌权的人，更是一个可以轻易掌握自己生存权力的人，于是她只能通过这种跪的方式向她的亲姐姐讨饶求生。尽管这样，但当玉秀期望能够像玉米一样利用自己的婚姻在城镇上博得立锥之地，与郭家兴的儿子郭左恋爱时，她不仅因为“外甥和小姨子”的身份无法跨越面前的现实障碍，更因为玉米“绝不会允许她做出有损于王家利益的事来”而彻底丧失了内心最后一点美好的向往。玉米故意装作无意的样子向郭左透露了自己妹妹在王家庄被村民玷污的事实，在妹妹惨遭内心煎熬和肉体困苦之后没有一丝一毫的慰藉，甚至在玉秀快面临生产之际抽了玉秀十几个耳光，打得玉秀的两个嘴角都流血了。玉秀生产后想看自己的孩子一眼，这个最小最卑微的请求也被玉米冷漠地拒绝了，“玉秀好看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不眨的，目光出奇的清澈，出奇地亮”，玉秀就这样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力，生存的希望和未来的期待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此她的生存权力彻底丧失。

（二）爱情权力的考量

三丫“懂事，手脚又不懒，是一个周正的姑娘”，自身血性相比其他人又旺了点，心气又高了点，就连端方的母亲沈翠珍都对她赞不绝口，可是这孩子却生在了孔素贞的家里。在当时强调对人进行阶级划分的时代中，由于母亲出生地主家庭便决定了三丫在政治上的劣势地位，她无法向其他女孩子一样去追求自身的美满婚姻，甚至对母亲也无法诉说内心的少女情怀，丧失了建立幸福家庭的权力。三丫曾经想过要争取要反抗，但是她面对的是王家庄强大的社会伦理观念，做媒的人像商量好了似的，介绍给她的不是地主的儿子，就是汉奸的侄子，再不就是还乡团团长的外甥，村民们合伙把她往粪坑里推，在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之后，三丫从自己局限的思想中意识到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主动出击，这是她追求爱情权力唯一的能够自主的筹码。在三丫心目中，端方是出身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与她相比有无尽的前景，他们俩不同出身不同教育背景使她的爱情追求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而且在对端方的爱情追求过程中，三丫过多地注意了爱情中的物质因素，而忽视了精神因素的存在，以她传统的观念和固步自封的想法，她无法摆脱出卖自身肉体来换取爱情的老路，无法从他人处获得正确的爱情指导。她先是选择了一块水红底子、蝴蝶花瓣花色的洋布为自己精心缝制了一件花褂子希望吸引端方的注意，在为婚姻问题与母亲争执闹僵了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下定决心拿自己的一身去赌，并且决定赌输了她这一辈子就不嫁了。在与端方私会于河西的黑夜中，她勇敢地“直接扑进了端方的怀抱。一点过渡都没有，直接把等待变成了结果”。在王家庄小学的教室里，三丫将自己纯洁的身体完全贡献出来了，教室变成了天堂，是只属于三丫的

漆黑、无声的天堂，“三丫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己的身子。只有身子才是三丫惟一的赌注。三丫不会保留的，她要把赌注押出去，全部押上去”。但事实上，让端方魂牵梦绕的却是自己的高中同学赵洁，三丫对端方的爱情只能算得上是单向的，端方在自己男性身体欲望的牵引下，实施了对三丫的身体占有，连赵洁的形象也一点一点地在他心中模糊了。三丫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可悲之处，她以为她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爱情的追逐，但是这种极端而又缺乏精神实质的方式最终只能将她引入更深层的煎熬，导致了她的死亡完成对生存环境压制人性意识的反抗。

同样是对端方有意的吴蔓玲，在对爱情权力的追求方面，却与她追求政治权力的意识相差甚远。吴蔓玲身上的王家庄党支部书记的政治身份使她不能向端方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只能在和端方简单接触时凭借自己的权力地位要求端方留下来一起走走，在聊工作的同时顺便将心里隐蔽的一些话和端方“谈谈”，但是更多的时候吴蔓玲走在前面，端方漠然地跟在后头，两人无法建立正常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吴蔓玲最终将爱情愿望放在了希望在端方当兵前和他“好”上一段时间。可是，当混世魔王为了自己当兵离开王家庄的私欲对吴蔓玲进行强奸威胁后，吴蔓玲出于自身权力的维护意识，只能放走混世魔王而舍弃对端方的爱恋，将个人情感埋藏于心底，无法皈依的内心最终只能接受一条狗的暧昧和癫狂。小说的最后，吴蔓玲被她那只叫“无量”的狗所咬伤至疯，在其发疯时终于喊出了她内心深处的话，一口咬住了端方的脖子，完成了她最后的情爱表白。思想自由的空间对于吴蔓玲来说太过于奢侈，就连身体自己的获得最终也要以疯狂为代价。

（三）私欲权力的追逐

玉米是毕飞宇乡村女性小说中关于权力不得不提及的代表，她不仅仅是权力的受害者，更在权力的耳濡目染中逐渐被权力意识所腐蚀，滋长出掌控权力的欲望，然后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不惜牺牲自身、家人的幸福，这个性格转换的过程既自然贴切又发人深省。因为有权力的庇护，父亲王连方可以在王家庄为所欲为，玉米的婚事才可以与众不同。当有人给她介绍了当飞行员的彭国梁做婚姻对象时，就是连王连方这种见过世面的人在听到“飞行员”后，都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玉米心里也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非村里的其他姑娘能同日而语的了。但是父亲因破坏军婚后被双规，王家人一下子丧失了权力所带来的“特权”。当玉叶在学校把同学们的墨水瓶给打散了，老师再也不会“一分为二”看待问题了，玉米只能带上自己的十个鸡蛋平息了事情；紧接着便是玉米的妹妹玉秀和玉叶在看电影散场后被王家人有预谋有计划地糟蹋了；最让玉米痛不欲生

的是自己爱情、婚姻的最后希望——彭国梁，再听信他人谗言后和自己断绝了关系，玉米躺在床上结束了原本留给洞房的处子之身。经过这一系列事情，玉米意识到必须重拾权力，而她作为女性最快速获取权力的方式就是自己的婚姻，这个婚姻不再是建构在美满爱情的基础上，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追逐。为了权，玉米的灵魂已经严重扭曲，她愿意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青春，最终如愿地和权力的象征——年逾五十的干部郭家兴结合了，虽然结婚的时候新郎都没有出面，只是派来了公社的文书，但是玉米却认为值了，坐在公社小快艇尾部的露天长椅上离开了王家庄，玉米的故事在此自然结束，她正式由一名纯洁少女转化为一个权力欲望下的牺牲品。

玉秧和两个姐姐玉米、玉秀的生活有所不同，她能够考上师范学校来到城里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她远离了家庭中那些的权力纠纷，从来没有奢望权力，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能够在三千米的长跑上拼尽全力为八二（3）班的集体荣誉榜上添上一分，甚至对于楚天的爱情也只是她小脑袋里偶尔冒出的“小秘密”，将他藏在秘不示人的角落里头，期望着心有灵犀的温馨。一个正常健康的学校应该为玉秧这样单纯的女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深造的平台，但是，这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学校却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放在了整风肃纪、阶级斗争中，权力的阴影逐渐笼罩着每一个人，最终玉秧还是像玉米、玉秀以及王家庄的其他女人一样在权本位、男人本位以及人性缺陷的泥潭中迷失了自己。玉秧最初并不想和她的同学庞凤华、苏姗姗一样出人头地，她只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魏老师所要求的“汇报”工作，但她渐渐发现了对权力的投靠，具体地说是得到老师的偏爱，只能是这所学校里实现自己理想愿望的唯一途径。城市男性代表魏向东在玉秧改变命运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所谓的老师最热爱的事情便是和女教师们调笑，他努力投身自己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窥私欲，以此来昭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玉秧在一连串的打击与失意下，逐渐喜欢上了魏老师所委派给她的“工作”，认为她的“工作”那样地富有魅力，自己躲在暗处却能够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别人的秘密探看得一清二楚。当玉秧在这种阴谋与暴力文化的怀抱中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告密者”时，那么最后沦为性无能兼性变态者魏向东泄欲的玩物就顺其自然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在畸形权力的驱使下失去了纯真失去了理性，更为可悲的是，她深陷其中却全然不知。

二、探究欲望, 审视权力滋生的温床

毕飞宇笔下塑造出的这群全新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的悲剧命运背后，表现出对权力惊恐、彷徨、焦虑和对峙意味的精神特征，作者不仅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这

种整体性中的某一部分进行了必要的细究和夸张，突出了时代背景中的某些非理性特质，使人物更快速地进入这个空间，并且细致分析人物内心的人性异化。

（一）环境的狭隘与闭塞

《玉米》和《平原》两部小说不仅将叙事时间都放在了70年代，而且将空间始终锁定狭小的“王家庄”中，这种的巧妙设置使得读者很难将这两部小说分割开，在文本结构上构成了对70年代里封闭性乡村社会的一种形式隐喻，这种制约性环境在客观上助长了人物的破坏性冲动性，也确保了小说在悲剧意义上的冲突效果。

小说里的王家庄只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落，和中国版图上的其它乡村社会一样，传统的农业文明夹杂着时代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村民们不能定义出什么叫“国家”，何谓“政治”，但“国家”、“政治”的影响却渗透于乡村一切活动中，风云激荡的历史对它来说，“显得有些遥远，有些虚无，甚至有些不可琢磨，但是，它同样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潜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验证了王家庄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依然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¹由历史的革命话语与传统伦理建构出了难以撼动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压抑使得人们内心的情感、心灵的愿望都找不到健康合理的表达方式，最终只能以极端的方式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力。

在王家庄如此的生存环境中，乡村女性都处在精神被压抑，身体被规约的状态下，无论是以三丫、红粉为代表的乡村女青年，还是在王家庄能呼风唤雨的村支书吴蔓玲、为走出王家庄不择手段的玉秀，以及以柳粉香为代表的“牛鬼蛇神”等，她们虽几经挣扎，却难以走出历史灾难和政治意识的折射，上演了一幕幕生存和人性的悲剧。悲剧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在于外力对个人心灵、价值的扭曲，如地主成分的孔素贞，是一个受过些教育懂得些文化、与沈翠珍、大辫子有所不同的农村妇女，可由于自己的地主出身间接导致了儿子成了被侮辱的小奴才，女儿为爱情而死，她曾经凡事抱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生存信念，把“好起来”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企图通过虔诚的祷告来摆脱现实的苦楚。但是她还是被村民们抄了家，包括孔素贞在内的王秃子、孔婆子等六人又多了一个“死不悔改的封建余孽”的称号，并且像牲畜一样被孩子们骑在身上玩，游街示众后还要跪在王家庄的水泥桥上“晒太阳”。狠毒的太阳炙烤着他们，“膝盖下面的水泥板就更蒸了，比太阳还要烫。像一个大烙铁，还有点儿像一个大蒸笼。三点钟过会你会产生

¹ 徐安辉：《回归生命本体的历史叙事——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意蕴解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39页。

错觉，觉得自己差不多熟了，只要一站起来，所有的肉就全掉在了桥面上了，只剩下一个光溜溜的、白花花的骨架子”。作为地主婆子孔素贞，游街游了起码都有五十回了，但是她还是抹不开面子，无法接受人心的冷漠和政治暴力的残酷。

（二）道德的异化与失落

权力体系中的种种暴力、阴谋、争夺，造成了人性的道德滑坡，道德的异化与失落取决于社会对个体欲望、个性价值的评判，当欲望泛滥，人性的恶之花便找到了得以滋生的沃土。在它强有力的冲击之下，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逐渐瓦解，女性被推到更为严峻的生存境地，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达到自己的主观目的，而渐渐丧失了女性特有的善良意识，异化了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人性关怀。

当玉秀由于父亲的种种劣迹被村民们报复失身后，却被二姐玉穗当着全村人的面骂作“尿壶、茅缸”，玉米刚出嫁离开家，姐妹间便没有了掌舵者，亲情的温情脉脉立马演变成人性的阴暗。当和玉秧一样从乡下考上来的庞凤华，凭借班主任的得宠轻松获得校卫队成员这个荣耀的身份，并且轻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苏姗姗，玉秧本性好强上进的报复欲望被激起，她坐在魏向东的大腿上“汇报”了庞凤华与班主任的最新动向，致使两人被隔离审讯，成为学校攻击的“落水狗”。当玉秀迫于无奈生下郭左的私生子的时候，玉秀的亲姐姐玉米竟然只在盘算怎样把孩子处理掉，指责、谩骂玉秀的不要脸，残酷地告诉玉秀“孩子死掉了”。

在这些事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冷漠，人们的交往中处处充满着陷阱，稍不小心就会让自己遍体鳞伤，而原本应该给予人性的关怀在字里行间却表现得少之又少。女性在面对周遭的其他女性时，没有一丝人性意识的关心与思考，有的只是对自己未来生活自私自利的打算，甚至对自己的至亲都不能加以关爱、体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女性是被损害的对象，她们所遭受的苦难值得人们的同情，但同时她们却又是个人悲剧命运的共谋者和制造者。

（三）内心的脆弱与屈服

毕飞宇所构建的女性权力世界中，将更多的视角放在了女性自身，追求女性自身应有的性别意识，这种性别意识是与男权文化承袭的男尊女卑相背离的。在女性自身表现出的对权力的盲目追逐背后，我们应该注意到她们内心世界的脆弱与无助，以及意识中潜藏的对命运的屈服。

无论是玉米还是玉秀，作为当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她们都没有想过要凭借个人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拯救家庭，而是单纯地相信婚姻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契机，就连玉

米在王家庄最不喜欢的女人——柳粉香豆真心地告诫玉米：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一个机会。这些女性都期望抓住婚姻这颗稻草，并且愿意为此彻底放弃一个女人应有的全部价值，以期望在丈夫权势与荣耀的余荫下得到一些庇佑。玉米对彭国梁、郭家兴的选择，不仅是对权力的投靠，也是对男权思想的认同，从家中逃出的玉秀也是如此，她一方面想和玉米一样得到郭家兴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婚姻来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甚至与郭左的爱情悲剧中也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因素。当然，与玉米不同的是，造成玉秀最终悲剧的还有来自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念对她的折磨与桎梏。当会计小唐想撮合玉秀和自己的儿子高伟时，玉秀意识到了这是自己的一个机遇，也曾想过要好好把握，奋力一搏，可当她跟高伟独处时，却不知道该怎么弄得，就会突然想起大草垛旁边混乱的喘息声，想起了自己被强奸的那个夜晚了。其实在她的心中，一直笼罩着一层挥赶不去的阴影，“被人啃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作为一个女子自己已经很不值钱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比自我作践还让玉秀难过，玉秀对自己绝望，这份凄凉，可以说欲哭无泪”。玉秀被人强暴后，不仅遭到王家庄人的唾弃，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观念已经不自觉地转化为她内心的认同，她从王家庄逃了出来，却终生无力挣脱出曾经的伤害所带来的精神地狱。这种心理上的巨大障碍，使她丧失了对个人价值的自信与肯定，面对喜爱的郭左时，尽管情窦初开，心底的自卑和来自伦理观念的压迫，最终使她把火一样的激情冰冻在心灵深处。

毕飞宇着重从内心的角度来探究出女性走向自我失落的真正原因，在她们的人生悲剧中，个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是她们亲手为自己的人生酿造了最后的苦酒。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女性的生存，而且倾注着对女性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关注于相似女性的自我异化，反思着如何改变女性内心的屈服。

三、 剖析策略，解读权力叙事的龃龉

（一）权力叙事的特殊性

1. 女性被放逐至权力边缘

纵观古今，权力的中心都是男人，各种文化惯例习惯于将男人和女人在权力的范围里进一步分开，女人被放逐到了权力边缘，这些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女人，一方面身不由己被权力控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接受吸引，企图占有它，从男人的手里分一杯权力之羹。

玉米出生在王家庄最“显赫”的家庭，是所谓的“高干子女”，王家的高门槛，造

就了她的高心气，对没齿的小八子，村子里的男孩一般要在学校里才用大号或学名，可玉米却把小弟弟说得有名有姓，特别地慎重、正规，和人家孩子区别开来，以彰显自己作为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同时，基于对权力的清醒感知，她敢去欺负村里和父亲有一腿的女人，极具弥漫性和渗透力的男权对玉米起作用了。她本人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得到父亲权力的庇护罢了，却敢于嚣张地欺负没有得到权力庇护的人。但是心气向来很高的玉米，在长相并不好然而却是“飞行员”的彭国梁面前，心气已经去了大半，她自卑了，甚至无端地自惭形秽。而在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面前，玉米不仅对自己没有一点自信，甚至连自尊心也被扒光了。男子的身份和地位一下子就抹杀掉了女人的心气和自信，这其实还是依附于女性内心的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所导致的，表现出了女人作为权力附属的边缘的地位。

如果说玉米是一个企图借以男性世界而获取权力的女性的话，那么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在表面上看来截然对立，但在实际上却是最为接近的另一位女性——有庆家的女人柳粉香。柳粉香虽然比玉米多出些人生经验，有过更多与男性周旋的经历，但她同样无法突破男性沉重的权力之围，而只能以顺从的方式来挽救自己，挽救玉米。当玉米要与彭国梁相亲却无衣服可穿时，她体贴地将自己昔日报幕时的衣服送给玉米；当玉米被彭国梁无情抛弃时，又是柳粉香及时地为玉米宽心，倾听玉米内心深处的苦闷。但是，一声“粉香姐”却是暂时的，玉米还是嘲讽她，怨她多事，无法忘记父亲与这个女人的勾当。对男人宽容却对女人严苛，甘愿顺从趋附男性却鄙视辱骂同类，这种悖谬的状况呈现出男权统治下造成了女性世界的“精神分裂”。正是这样的“精神分裂”，使得女性进退两难，要么在对于男性的依附中消失自己，只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被异化为物；要么在对男权的抗争中被无形中消灭，在价值评判中成为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被异化为非人。

2. 心灵深处依附的“鬼”

毕飞宇在《小说选刊》选载《玉米》时，附了一段小小的声明，题目叫做《我们身上的鬼》，深刻地指出：“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女人对权力的贪求和畏惧，对自身性别的贬抑，就是我们意识中的“鬼”，如果不驱逐它，女人活得就不是女人。

玉米之所以破釜沉舟地走上用自己一生的幸福来换取权力的这条路，不仅是因为爱情的破灭，更多是权力庇佑的丧失，因此她只能紧紧抓住婚姻的绳索，这种纯功利的手

段不可避免地异化了她的婚姻。从她的悲剧中我们也可看出玉米的决绝和无奈,那是一种痛彻肺腑的伤痛,痛过之后就是麻木和彻底的妥协。“一个清纯的乡村女子,就这样被权力意识这个‘鬼’逐步地夺去了魂魄,成了一个牺牲者、感染者和传播者,尽管王家因她而重振旗鼓,但玉米却从此走上了权力受惠者——受害者——追随者——间接拥有者——维护者的腐化之路。”¹

玉米、玉秀、玉秧三者的性格一个比一个简单,功利意识一个比一个淡薄,可她们最终却在权力的漩涡中逐渐沦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们三者都无法逃脱内心深处“鬼”的纠缠,这个“鬼”已不仅仅只是表面意义上的“官权意识”,而表现为更温和、生活化的权力欲望,它深藏于生活细节中却更具持久的渗透力。对女性来说,是什么让她们彻底迷失了自我?毕飞宇认为:生活不只有“蒙着”的眼睛,也还有一双手。这双手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政治,但不可否认这双手的力量强大无比,对这双手的任何妥协都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不提掉这个“鬼”,不摆脱那双“手”,那么女性最终的一切反抗只能是轮回,无法获得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意志。

3. 体制和规则内的反抗

小说中70年代乡村女性的普遍现象是通过与男权结盟来实现个人价值、改变个人境遇,如玉米以婚姻换得权力来满足自己改变王家命运的企图,吴蔓玲以消磨自身女性特征来换取政治权力等。我们看到了男性社会中女性的沉浮,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以扭曲人性、失去人格为代价的,失落自我的女性伴随独立意志的消解,内心出现挣扎、抗争、迷惘,逐渐意识到失落了个性、失去了自我才是最沉痛的失落。

她们不是自觉放逐个性意识与欲望的传统的旧式女人,为了追求自我价值,她们也曾奋起反抗,在权力生存的隙缝间挣扎过。但是,她们未能从专制体制与集权文化所造成的精神困境中走出来,没有在体制外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她们种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都不过是体制内的选择、规则内的挑衅。这种抗争行为无异于作茧自缚,最终从独立主体的奋斗者变为权力的投降者,成为权力体系内可有可无的仆从。其实,仅凭一己之力去冲破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文革中恶性膨胀的政治权力的双重箍制是注定失败的,但是明确拒绝与反抗权力体系,认同自身理想的行为却是曙光。封建传统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毒害,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被改变的,70年代狭窄的人生视野和积淀在意识深处的传统观念注定了女性对现实的认知和自身价值的定位都走入了误区,无法意识

¹ 钟琴:《“鬼”的纠缠与挣脱的可能——毕飞宇“玉米”系列的解读》,《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第31页。

到在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需要面对现实生活背后所蕴藉着的尖锐的伦理冲突、人性冲突、文明冲突。

（二）权力叙事之双刃剑

1. 审美内涵的深层化

相较于同时期的作家，毕飞宇更擅长于从日常化的表现手法中对大多数普通女性的悲剧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发掘，从司空见惯的依附男性权力的行为中揭示出人性的丑陋，及其对女性主体的残暴与伤害。在以往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往往表现为一种被动、附属的状态，但是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却开始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她们主动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以期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此她们不择手段，不惜放弃道德准则、人的尊严与良知，扭曲人格，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每个中国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权力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背后包含了无边无际的苦难。毕飞宇的权力叙事着重剖析了无法摆脱权力所带来的欲望和禁锢而在权力泥潭中愈陷愈深的女性，她们只能被权力所征服，向权力做了彻底的妥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隐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蕴，它已经超越了历史时代的意义，具有更深层次上的审美内涵。毕飞宇在对传统女性文化意识的审视中，并没有在开辟出新的领域，但是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这些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们身上的文化负重，特别是女性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自我意识上作茧自缚的过程。

同时，毕飞宇在对女性世俗化的人生悲剧和宿命般生存境遇的描写中，注入了自己的思考和意义追问，体现出一个新生代男性作家自我批判的人文情怀，深化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关怀。面对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实，毕飞宇处于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冲突中，既有清晰的认识，又有挥赶不去的情感认同。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女性，竭尽全力渴望把自己从难以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尽管由于理性的匮乏或时代的限制，最终在盲目而徒劳的抗争中毁灭了自己，但是这种不甘于现状的努力却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激情。

纵观毕飞宇的作品，作家不仅关注于女性为满足私欲所导致的人性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更以一种同情的眼光看待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所付出的沉重的情感代价，“这种由欲望而来的痛苦，在毕飞宇的小说中集中表现为女主人公在两难选择时其心灵情感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欲望的驱动下，一旦在行为上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那么，人性中尚未泯灭的尊严、人格与良知便会向自我发出严厉的谴责与渴望救赎的吁求。”¹

2. 女性疼痛的类型化

毕飞宇在《平原》中对集体群殴事件这样描写到：“疼这个东西过瘾，在你被击中的时候，在你的疼痛汹涌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毫无畏惧，你的勇敢是惊人的，你的爆发力是惊人的，怒发冲冠具有无可比拟的快感，你一下子就疯狂了，成了酩酊的、强有力的人。疼痛能使胆怯的人大胆，大胆的人英勇，英勇的人壮烈。你会为自己而震惊。你的潜能是巨大的，那些你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你一下子就做出来了，眼睛都来不及眨巴。”

毕飞宇喜欢从历史和生命的两个角度去发掘女性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精神缺失，荒诞历史中深层人性的变化，普遍人性的苟安与堕落，加上沿袭的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了特殊的思想观念和生存心理。其实毕飞宇用心塑造的并非是单纯的小说人物，而是社会中人们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他想表现的是人类在现实生存环境中，生命深处无法消解的精神状态。作品中，表面的浮图丝毫遮掩不住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强烈的现实感，这些女性形象在追求权力欲望满足的历程中所表现出了疼痛意识，在思想上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展现了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社会阴影，体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的尖锐质疑，同时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折射。

在这些疼痛意识下，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失落自我的女性，她们内心的挣扎、迷惘与绝望，以及扭曲、倒退与堕落。虽然在权力欲望的推动下，那些乡村女性放弃了做人的底线与原则，但她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心灵深处未曾泯灭的良知，如吴蔓玲被混世魔王剥夺贞操与尊严后在内心留下的被损害被玷污的永久的痛，玉米在对郭家兴献身后体会到的屈辱，玉秀被郭左抛弃后的生不如死。人性与人生的悲剧在作品中错杂交融，形成冷而尖锐的黑色幽默和黑色悲哀，作家不仅关注女性为满足欲望所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更同情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所付出的沉重的情感代价，但是这个创作模式却使女性的疼痛呈现出了类型化的特点，缺失掉了女性作为单独个体所应具有的独特魅力。

结语

毕飞宇在《为我的孩子而写》一文中写到：我对21世纪的希望是简单而又基本的，21世纪的水是水的样子，风是风的样子，草像草的样子，天像天一样蓝，更关键的是，

¹ 宗元：《无望的挣扎 人性的扭曲——论毕飞宇近作中的女性世界》，《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第87页。

人像人一样生活。毕飞宇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形式，呼吁美好、健康、和谐而又不悖于人性的生存状态，并且对充满权力诡计、阴谋骗术、暴力合法性的社会和它塑造的女性卑劣人格深深地忧虑。他认为新时代的女性，只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避免被物化、异化的危险，才能更自如地体验内在的幸福感，而这种自我，是不屈从于权力、不屈从于社会、不屈从于男性的，它追寻着人性的光辉，探求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且能够以独立个体的姿态立身社会，争取个体的自由和自主。

参考文献

- [1] 毕飞宇：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 [2] 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 [3]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 [4]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5]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 [6] 刘泽：等待被作品撞上的那一刹那——毕飞宇访谈，河北日报，2005年12月2日。
- [7] 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期。
- [8] 毕飞宇、周文慧：内心的表情，长江文艺，2003年第12期。
- [9] 毕飞宇、贺仲明：关于新时期文学现象以及创作的对话，2006年第7期。
- [10] 李敬泽：从“写字”开始——读《谁在深夜里说话》，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
- [11]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自序，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 [12] 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小说《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 [13] 毕飞宇：《玉米》之外的点滴，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 [14] 洪治纲：读毕飞宇的小说，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 [15] 菲尔丁·汤姆·琼斯、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16] 爱·摩·福斯特：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